

饱蠹楼中“扫”吴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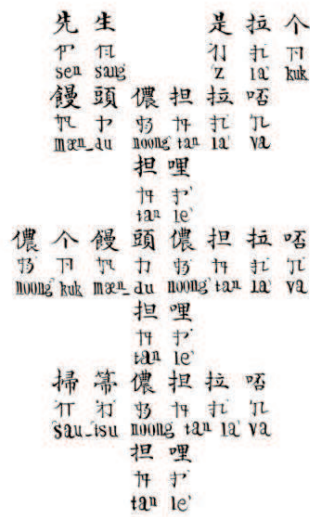
■ 盛益民

研究晚清吴语方言，有一批重要的域外文献。笔者协助游汝杰教授合作主编的《近代罕见吴语文献集成》(上海教育出版社,2023),就是百多年后的一次集结展示。丛书第一辑(4册)共收入吴语文献15种,每种著作之前均附有导读。相信在语言学的价值之外,这套采取全影印方式的文献也将为文学、历史、宗教、文化、地理、教育等多个学科提供相应的参考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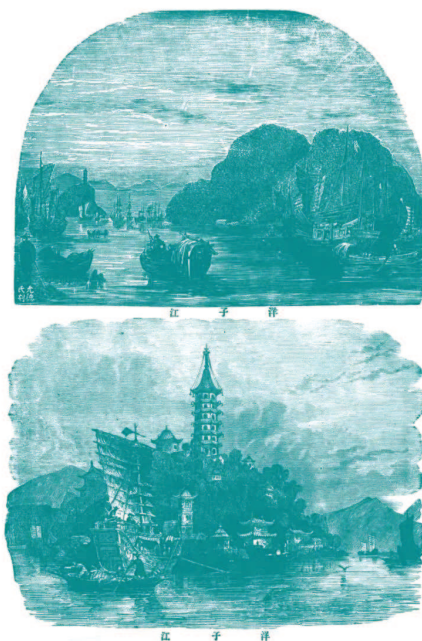
伴随丛书的出版,笔者几年前在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搜寻馆藏吴语文献的一段往事不禁涌上心头。博德利图书馆位于牛津大学城中心,建立于1602年,是欧洲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钱锺书先生负责英伦求学期间将其戏称为“饱蠹楼”(乃音义兼译的妙例),牛津的学者则常昵称为 Bodley 或 the Bod。现今博德利图书馆的藏品多达1100万件以上,怪不得詹姆斯一世国王来访问时,曾望着图书馆的丰富藏书感叹道:“若不当国王,我愿任一大学教席;若不沦为阶下囚,我甘愿囚禁在图书馆里,和这些优秀的作者锁在一起!”笔者2019年下半年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参加国家语委海外研修班期间,利用课余时间,五赴博德利图书馆查询、探访传教士所著吴语方言文献,与之结下了一段特殊的缘分。

弗兰西斯·培根评价博德利图书馆是 An ark to save learning from deluge(“拯救学问于滔天洪水中的方舟”)。博德利图书馆有大量珍贵的中文文献,其中像所藏的19册《永乐大典》,最早记录钓鱼岛的《顺风相送》等文献,学界早已耳熟能详。可是博德利图书馆建馆初期,只有那些古希腊罗马作家、基督教的早期教父、欧洲国家新教改革家及同时代的英国国教牧师的著作才有资格登堂入室,要到1620年第二任馆长才把大门向一般的英文文献敞开,1623年出版的《威廉·莎士比亚喜剧、历史和悲剧》初版本才得以在图书馆馆藏中占有一席之地。英文书籍尚且如此,早期中国书籍质量之不尽如人意可想而知。十七世纪早期,荷兰派往中国的贸易远征队带回的书籍良莠不齐,混杂许多残次品,可即便是印刷粗糙的廉价版“四书”,因为当时欧洲人并不了解,也在图书馆中小心地珍藏了起来。直到十九世纪末,因为有高水且对中国文化更感兴趣的有识之士积极介入,才使得博德利图书馆的中文馆藏渐次丰富,质量也稳步提升。

中文书籍的整理研究也是始于这一时期。英国伦敦教会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在1876年编成了博德利历史上第一本中文典籍的书目



▲ 《上海土白功课》与《地理志问答(上海土白)》内页,均收入《近代罕见吴语文献集成》(第一辑)



▲ 博德利图书馆馆藏吴语文献

A Catalogue of Chinese Work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完善。1935年,受牛津大学邀约,当时的北平图书馆派出向达先生帮助整理中文书籍,向先生除了写就《记牛津所藏中文书》(1936)一文外,还发现并抄录了流失海外的《顺风相送》《指南正法》等重要史籍。近二三十年来,在前中主任何大伟先生(David Helliwell)的积极推动下,博德利图书馆对6000多种中文古籍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归档,多数都归入 Sinica 的编号系列中,也提供了专门的网站 Serica 供读者查阅书籍信息。

而笔者与博德利图书馆的这段缘分要从一位英国伦敦教会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说起。伟烈亚力自32岁来上海,到1877年因年迈体弱、视力衰退而返回伦敦定居为止,在华三十年间,协助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主持墨海书馆工作,翻译了《续几何原本》《数学启蒙》《代数学》《代微积拾级》等重要著作,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影响深远;同时他还创办了上海第一份中文月刊《六合丛谈》以传播西学;此外,他也积极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出版了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中国文坛》)、“Jottings on the Science of Chinese”(《中国科学札记》)等重要著述,影响深远。

伟烈亚力的藏书大约有2万种之多,其中90%以上的收藏在1882年转让给了博德利图书馆。正因为伟烈亚力的用心与善举,使得“伟氏藏书”(Alexander Wylie Collection)成了博

德利图书馆的重要特藏藏品,也使得该馆成为中国研究学者的圣地。“伟氏藏书”中大约有100多种吴语文献,其中又有一半左右是全球孤藏,具有无与伦比的学术价值。

谈到博德利这批吴语文献馆藏的来历,不得不提十九世纪的两个大型博览会。一个是1876年为庆祝美国建国百年在费城举办的“百年国际展”,中国海关委托伟烈亚力展出了约1000本中文、约100本英文作品,绝大部分是伟烈亚力的私藏。第二个大型展览是1884年在伦敦举办的“国际健康展览”,中国海关效仿之前的成功经验,又搜集到约600册中文著作前来参展,其中主要还是传教士著作,目录详见《1884年伦敦国际卫生博览会中国展品图示目录》。

由于从1876年开始,享誉盛名的理雅各担任了牛津首任汉学教授,两次展览的展品以及伟烈亚力的绝大部分私藏悉数归入博德利图书馆。今日的馆藏中,我们还能依稀看到两次大型博览会的身影:“百年国际展”的参展图书封面上,贴有一张粉红色的标签纸,记录了展品编号,以与伟烈亚力为展览会编写的书目相对照;而“国际健康展”的参展图书封面上则贴的是黄色标签纸,列出了展览名和参展方,还详细列有跟目录对应的展品编号、中英文书名、译作者和册数等。

香港中文大学黎子鹏教授的《默默无闻的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十九世纪西教士的中文著作及译著》一文估计,博德利图书馆所藏传教士文献总数接近1600册,“在全世界同类收藏中数量最多,且种类最齐全”。结合 Serica 网站的书籍信息及博德利图

书馆的搜索引擎,笔者初步统计得到该馆馆藏有约122件吴语传教士作品,以上海方言和宁波方言为多,除去半数宗教类内容,可分类列表为:

语言类	通俗类	
上海方言	7	16
苏州方言	0	2
杭州方言	2	0
宁波方言	8	18
台州方言	1	0

博德利图书馆吴语文献馆藏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吴语文献馆藏数量很可能居全球之冠。博德利图书馆共藏有约122件吴语文献著作,据笔者初步统计,海内外各家图书馆(包括剑桥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在吴语文献的馆藏方面,均无出其右者。正是由于伟烈亚力、理雅各等先贤的用心与付出,为学界保留下来这个吴语文献研究的宝库。

第二,馆藏吴语文献种类繁多。牛津与剑桥的“争斗”真是无处不在:1984年,在争取大英圣公会旧藏《圣经》上,两家又大战一番,最终以剑桥大学取胜而告终,从而使得剑桥大学一跃成为全球《圣经》收藏最丰富的机构。伟烈亚力于1863年起担任大英圣公会的中国代理人,其所藏的《圣经》悉数赠予了该会的图书馆,之后也一并归于剑桥。因此,剑桥大学图书馆虽然也收藏了约100种吴语文献,但是主要以《圣经》为主,品种相对比较单一。而博德利图书馆的语种则极其丰富,尤其是其中丰富的语言学习类(比如1904年出版的宁波方言字典《宁英列韵字汇》=Nying Ing Lih Yuing Z we)和通俗读物类(比如吉士夫人编的上海话小说《亨利实录》、丁魁良编的宁波罗马字本《地理书》等等),是之前学界关注较少的,可



▲ 博德利图书馆馆藏吴语文献

供各个学科的学者使用。

第三,馆藏吴语文献多为海内外孤本。根据笔者的初步统计,该馆馆藏吴语文献有约一半是海内外的孤本,比如理雅瑞(Reuben Post Lowrie)的《三字经 上海土白》(1859)、秦右(Benjamin Jenkins)的 Dialect of Shanghai, China(《上海方言》,1861)、丁魁良(W.A.P.Martin)的宁波话罗马字 Son-fah k'ae-t'ong(《算法开通》,1854)、路惠理(W.D.Rudland)的 T'e-tsiu t'u-wa ts'u-oh(《台州土话初学》,1880)等等,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如丁魁良的《算法开通》曾被误译为《数学快通》《数学快懂》等,是现今所知最早的汉语方言数学教科书,也是国内已知最早的近代数学教科书之一,笔者团队正在将本书转写成汉字版,以便学界可以更好地利用。

日前,蒙关西大学内田庆市教授告知,上海师范大学丁刚老师与福建师范大学潘琳老师在理雅各的个人档案中发现了五本语言学习笔记,其中有两本是学习上海话的。理雅各只在上海做过短暂的旅行,为何要学习上海话呢?理雅各档案中偶尔也会混入其他人的手稿,这些上海话的学习笔记真的是理雅各的吗?这些谜团还有待解开,不过这些新发现的有趣材料,又让博德利图书馆的吴语文献多了一份奇妙之处。

钱锺书先生留学牛津期间,长期浸润于博德利图书馆,并自诩为“饱蠹楼”饕餮之蠹,先生在牛津期间的读书时光也常被概括为“饱蠹楼中,横扫百典”。如果套用这两句话,也可以把本人的这段探访经历概括为“饱蠹楼中扫吴典”。其中的“扫”倒是两层含义:一方面,笔者对图书馆中尚未扫描的将近七八十种吴语文献逐一进行了扫描,基本上可以说是“横扫”了图书馆中的相关文献,只是由于时间紧张,并不能像钱先生那样坐下来静静品读,留下了颇多遗憾;另一方面,“扫”也指“扫描、拍摄”,英国图书馆均秉持图书服务读者的宗旨,所有图书均可查阅并在无闪光情况下进行拍摄或者扫描,对于笔者这种不能在牛津久待的人来说,绝对是一大福利,让我有机会在相隔一百三十多年后,又可以重新把部分珍贵的吴语文献带回给中国学界。《近代罕见吴语文献集成》(第一辑)还未及收入博德利图书馆的相关馆藏,我们在编辑丛书的“第二辑”“第三辑”时定会着重考虑。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恋恋笔记本

■ 编译/黎文

今天的人们每天手触键盘,已经忘记了执笔摩挲的感受,也失去了记下事物的非凡乐趣。做笔记是可以令人热爱的爱好。象征主义大诗人保罗·瓦莱里对做笔记的投入就一点不比诗歌少。他每天一早起来便开始写笔记,长达半个世纪,足足攒成261本。他认为,“把这些时间奉献给精神生活后,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我就可尽情挥霍了。”

笔记本的名下,囊括了一个庞大的集群。在十三世纪末的佛罗伦萨,纸质而非牛皮做的价廉又牢靠的笔记本被用作分类账,刺激了复式簿记法的发展,对商业与国际贸易的繁荣不可或缺,于文艺复兴也是功莫大焉。这时候笔记本也出现在画家手中,也就是速写本——这些便携的空白本让他们能够反复揣摩周围环境,发展出更写实的技巧。

在意大利,还有摘抄经文、发表感想的名记 raparia,以及记录食谱、歌谱、祷文和个人信息的大杂烩 zibaldoni,这种笔记方便向朋友展示,也可传给亲友来阅读。当然也有走火风险——有一本 zibaldoni 上,很可能是原作者的兄弟在旁边补写道:“请注意,你邻牙倒齿,满嘴谎言,跟个无赖没两样,你就是个神经病话痨。”

近日,英国出版商、作家罗兰·艾伦在新著《笔记本:纸上思考的历史》(2023)中探索日记、速写本、笔记本、分类账和航海日志等等空白本是如何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继而塑造了未来世界。

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可能就是达·芬奇。他每天都在涂鸦、制图,留下数千页的手稿。他画下了波浪、气泡、漩涡,还列了一张汇总表,记录67个讲水流动的词。他在速写本上设计了泵、阀门、熔炉、研磨机,细致地描述了下巴、椎骨、脚骨。他探索几何、解剖学、力学、色彩。他还想象了预制的移动房屋和飞行器。他留下的这些笔记手稿充满无限可能,充满快乐和梦想。

在艾伦的书里,可以看到达尔文在小巧的袖珍本上发展他的进化论,眼瞅着阿加莎·克里斯蒂在一片潦草的练习本上策划百起谋杀案,还能了解到旅行作家布鲁斯·查特文如何在无意中促成了知名笔记本品牌 Moleskine 的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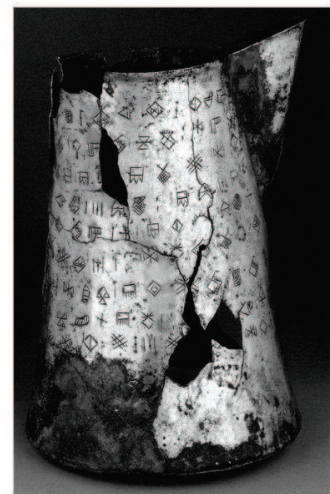
笔记本上留下了我们的直接观察、第一手重点信息,以及活生生的经验。艾伦认为,它是我们最可靠、也最全面的创造性思维工具,看似简陋的纸笔仍然是处理和保留信息的最佳载体,在这个数字超载的时代有非常特别的意义。可惜的是,今天许多学校的课程开始淡化手写。据研究,在纸上动笔这一行为有避免抑郁、抗击多动症等功效。可感可触的体验,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一种“具身认知”,也是当今世界快要失落的拼图。这大概是低科技、慢生活有利于身心的又一个例子。

书中还有一章,题为“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向重症监护室的丹麦护士致敬。护士们每天写患者日记,这些疾病而自我意识受损的人们每一处身体变化和每一次进步,都被详细记录下来。而关注、关怀、手写——艾伦相信,这就是爱。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助理研究员)

线性埃兰文字的破译之路

■ 张春风



▲ 银器上的线性埃兰铭文资料图片

线性埃兰文字(Linear Elamite writing)是公元前2300—1880年伊朗南部所使用的文字。五千年前的古伊朗,土壤肥沃,矿产丰富,埃兰人在此创造了璀璨的埃兰文明。他们在建立埃兰帝国的同时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原始埃兰文字和线性埃兰文字。至公元前七世纪,起源于两河流域的亚述帝国处于巅峰扩张时期,摧毁了埃兰帝国。亚述帝国在扩张土地的同时也把楔形文字带到了古伊朗,从此线性埃兰文字灭亡,成为一种死文字,沉寂在历史遗迹中。

2022年7月,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德塞特(François Desset)和同事们发表了《破译线性埃兰文字》一文,宣告这种古老表音文字的破译。

世界文字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是表意文字,一是表音文字。两者数量和造字规则截然不同,破译的原理也大相径庭。埃及象形文字和汉字属于最为典型的表意文字,文字数量繁多,文字的符号不仅和符号本身相关,也和语音有关。表音文字产生的时间较晚,所需文字数量较少,符号只和语音关联。判定

文字的类型属性是破译文字的基石。

埃兰文明历经古埃兰时期、中埃兰时期和新埃兰时期。古埃兰时期的原始埃兰文字属于表意文字,这是一种与原始苏美尔文字同时期甚至更为古老的文字,目前尚未破译。新埃兰时期,线性埃兰文字替代了原始埃兰文字。

对线性埃兰文字的最早研究可以追溯到1903年,法国考古者在伊朗苏萨古城发现这种文字。许久以来其一直被认为是原始埃兰文字的同质文献。在线性埃兰文字被区别开来,并确立为表音文字之后,学者们只要关注符号的读音,无需关注符号对应的语义,排列出完整的音节表就等于解读出了线性埃兰文字。

知晓对应的语言、专有名词(国王名、神名、地名等)以及双语对照文献是文字破译的三个必要条件。二百年前,埃及学家商博良使用三语对照的罗塞塔石碑打开了破译埃及象形文字之门。今天,德塞特等学者通过已知的楔形文字记载,发现了对应的语言埃兰语,查询到相关的专有名词,找到不同文字记录同一语言的不同及相似文献。这是一种可

线性埃兰文字破译之门的三把钥匙,但寻求解密之钥的路途并非平坦。

西方文字学家格伯曾说:“只要有足量的文献,如果知道对应的语言,那么这种表音文字终将被破译。”目前发现的线性埃兰文字的文献共有40种,根据材质不同分为七组。文字破译之始,学者们主要关注普祖尔-舒希纳克王朝文献。尽管有些文物上同时刻写了线性埃兰文字和楔形文字,但这些双语文献并非像罗塞塔石碑一样属于对照文献,它们只有部分名字和头衔是相同的,因此最初只破译了极少线性文字的符号。德塞特等人走了另一条路,以银制文献为研究对象(未知),以9篇楔形文字文献为参照(已知),最终抵达破译最为关键的步骤。由于这些银制烧瓶属于施马士基和苏卡尔马赫王朝时期,上面刻写的铭文已经高度标准化。这些线性埃兰文字写在了相同或相似的器物上,器物上还记载了完整的埃兰楔形文字。

目前研究条件下,所知的埃兰语是一种孤立的语言,尚未发现与周边语言相关的联系。在线性埃兰文字破译之前,只能通过同时代的及后来的楔形文字建立与埃兰语的联系,构建出埃兰语的基本规则。对于埃兰语的构建是建立在楔形文字和闪米特语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楔形文字的成果直接影响埃兰语的构建。记录埃兰语的楔形文字材料有限,文献中出现了语言文化的二元性,即阿卡德人占主体、埃兰人占少数的情况。楔形文字并不适合记录埃兰语,有可能做不到忠实记录。尽管埃兰语的重建困难重重,但一些专有名词和表达是

固定的,固定词成为文字破译的关键。

良好的前期研究基础,齐备对应的语言、专有名词和对照文献三把钥匙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2006年德塞特开始接触这种文字,看到神秘的几何图案,并被深深吸引。但他最初对记载的文献器物只能拍照,只看到局部文字。2015年他有机会直接接触实物,精准复制器物上的文字,才得以系统解读线性埃兰文字。

线性埃兰文字属于字母-音节文字,即线性埃兰文字字符中既有对应一个音节又有对应一个音素的情况,也叫半音节文字。线性埃兰文字的字符外形较为具象,属于几何图案。目前可识别的符号共有72个字符,记录73个音值,这些符号占总体总数1890个符号中的96.3%,其中有5个是元音符号,15个是辅音符号,53个属于音节符号。在音位表中,还有8个符号尚未被确认或不存在。文字阅读顺序一般按照从右到左,从上到下。时期略晚的线性埃兰文献中出现了分隔符号,用于区分短语、语段及句子。这些符号中存在异体、同音及合文的现象;拼写过程中还出现了文字冗余,以更准确地记录语言。这种文字也有不成熟的一面,表现为部分音素的省略和书写错误。

半音节文字系统在表音文字体系中非常稀少,较为典型的是古西班牙语伊比利亚半音节文字,其余多为注音字符,如汉语注音字符等。表音文字体系中,大多文字主要选择字母文字(一个符号

表示一个音素)和音节文字(一个符号代表一个音节)两种类型。字母文字所需字符数量最少,如我们熟悉的英语只要26个字母就能书写整个语言系统。相比之下,音节文字数量较多,需要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半音节文字所需的数量介于字母文字和音节文字之间。埃兰语中大部分词根是辅音-元音-辅音(CVC)和辅音-元音-辅音-元音(CVCVCV)形式,为了更忠实更精准记录语言,线性埃兰文字自然选择了半音节文字。

线性埃兰文字的破译,改写了表音文字的发展历史。线性埃兰文字中就有单纯的元音和辅音字符,分析语音的能力远远高于同时期的楔形文字,能精准地记录语言。只是战争导致这种文字未能远播就已埋没在历史长河中。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一个民族使用两种文字并非孤例,在中国也有例证。如中国历史上的辽代,契丹人创造了契丹大字(表意文字),由于契丹大字并不能很好地记录契丹语,后来又创造了契丹小字(表音文字)。还有目前仍在使用的文字的例子。云南纳西族的东巴在书写经书时,不仅使用东巴文(表意文字),也使用哥巴文(表音文字)。其共同特征是时期较晚的表音文字借鉴时期较早的表意文字。同样作为死文字的表音文字契丹小字破译进展较快,原因即在于表音文字字符较少,与语音直接关联,相比之下破译难度较小。这也是线性埃兰文字比原始埃兰文字先破译的原因。

中国尚有许多原始符号亟待证明是否为文字,如符号数量丰富的良渚符号、巴蜀符号、双墩符号等。这些符号的时间与线性埃兰文字的时期相当。如果具备足量的文献,出现固定词的双语文献,构建出对应的语言,那么这些中国的神奇符号也将离破译不远。